
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

——多元一体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

马俊毅

摘 要: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设中,如何认识多样性与共同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框架,中国的一体是“共同体”而不是“一体化”,中国的“多元”与“一体”并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而是融汇共生的。多元一体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是因为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对于西方相关理论的突破性与超越性,体现在:一是打破了多元之间边界固化的思维定势;二是打破了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固化边界思维;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全方位包含着多元一体主义,并提升与促进了多元一体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形成。

关键词: 多元一体主义 柔性多元 韧性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民族国家建设

近年来,随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对于一些相关学术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一些讨论认为,应加强对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规范性研究,不论哪种类型的多民族国家,皆面临“多”与“一”这个根本性问题,需要关注“多”与“一”之间互动的平衡点。^①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② 聚焦

^① 周平:《多民族国家是怎样的一类国家》,《江汉论坛》2021年第10期。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8月28日),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8/28/c_1127804776.htm)。

了多元与共性的关系,成为相关研究关注热点。笔者以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在“一”和“多”等方面的关系需要进行理论化与规范化的研究。多元与一体的议题具有复杂性,还有一些模糊地带,以“辩证”、平衡思维视之只是开端,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中国有着丰富的“多元”与“一体”共生融汇的共同体建设经验,既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辍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新时代我国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丰富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其对于多元一体的理论发展意义也需要进一步深化论述。目前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潮起潮落,在时代变迁中也逐步显现其凸显民族的本质差异而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共识性价值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中国的共同体建设经验无疑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一些新的启示,但其不是自动实现的,需要通过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话语转化来实现。

一、多元一体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三种理论路径的效应与机制

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族群多样性与统一的政治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系,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一体主义这三种理论路径。前两者缘起和规范化于西方,民族理论、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对其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后者缘起于中国,目前的实践和研究范围还基本限于中国,并且主要是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哲学与民族学理论来研究的,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多元一体主义”没有广泛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或政治理论来进行足够的研究或形成一定的话语权,原因在于现阶段其更多是作为中国的一种历史文化渊源与国家的多民族结构形成经验性和描述研究。已经有学者撰文提及,可考虑进行多元一体主义的理论建构,例如,王希恩指出多元一体理论可以提升为多元一体主义,多元一体主义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结构的概括,也是对世界民族结构的概括,是对文化相对论的扬弃,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超越。^①但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还未真正展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民族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这一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由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从历史政治学角度具有建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代贯通性逻辑的理论阐释力,并且在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方面,紧密结合新

^① 王希恩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暨纪念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刘海涛《纪念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其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的社会科学化与体系化开创了新格局。这也为我国形成多元一体主义的规范化理论提供了契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跨学科视野下深入阐释多元与一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逻辑关系,既有利于深化多元一体理论,也有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本文拟以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多元一体主义、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以下,以多样性(或者差异性)和共同性(或者一体性)为分析核心,执其两端而察之,对多元一体主义、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不同的整合机制及效应,以及造成实践中不同多样性的碰撞与结合过程展开分析。

(一) 多元一体主义中多样性趋向共同性的效应与机制

多元一体主义诞生于中国,是因为其具有真实的历史文化基础,费孝通先生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事实进行了描述。^①但是,多元一体主义作为规范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多元一体何以成为一种“主义”,首先,是因为其在多维度上的存在与显现。例如,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存在于事实、理论、意识形态、政策、价值理念等多个维度。^②实际上,多元一体主义也已经形成了多维度的存在,并且在意识形态、政策、理论、价值等方面更具有可行性与适应力。毋庸置疑,多元一体主义是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民族结构和文化交融的事实的描述,这种事实既在中国历史与现实存在,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此外,多元一体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意识形态、政策和价值理念等,都对现实产生着重要影响,并在保存多元性和差异性,促进共同性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多元一体主义中比较重要的理论难点,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差异性与共同性的本质等。实际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设中,如何认识多样性与共同性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果将共同体作为一个活态的有机生长体,则共同性与多样性两者可以融汇共生;如果以机械的理性主义将两者对立起来,则会认为它们是此消彼长的,欲求多样性而回避共同性、欲求共同性而削减多样性。而多元一体主义的特点在于建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与历史事实基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二者的紧张对立关系。这一事实得到了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学者的充分论述,但多元一体主义存在何种运行机制并保持差异性、增进共同性,消解两者间的紧张关系,目前还缺乏理论上深入的研究与总结。我们应立足于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思考角度,“同时超越实体论与建构论,在关照历史的前提下,从整

^①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周少青《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体的中华文明出发思考当下‘中华民族’的内在逻辑”。^① 从中国各民族从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繁盛包容、源远流长的韧性而进行考察,可以总结出多元一体主义具有以下几个重要效应。

1.乘数效应。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② 费孝通的这番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对多元到一体过程中乘数效应进行了描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元素不断丰富叠加形成博大的一体,一体中的多元仍然具有个性但文化元素已经相互嵌入或借用,形成不同主体间的密切联系与互相认同,虽然亦有分裂与消亡,但在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叠加、随机的排列组合中不断增长,文化总量、生产生活技术与智慧等创造性活力是趋于乘数效应增加而不是简单相加,更不是减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珍视多样性、差异性,并且各个文化之间始终具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动力。多元的充分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创造力的重要渊源。从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多样性之间的碰撞、交流、结合所形成的并不止于加数效应,而是乘数效应,也就是说,多样性、差异性的充分交流将以乘数效应的模式增加社会的文化总量与创造力。

2.凝聚效应。当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实现充分交流交融,其本身就具有去粗存精、优化组合、去繁就简、寻求精粹的聚合效应。这种凝聚和聚合效应有时因一些组织的有意识引导,有些因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强化,形成了文化的共同性因素。这种经过凝聚融合而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文化聚合机制,实际上是很多国家、民族文化形成的共同路径。例如,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同民族建立王朝,但南北方民族多次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服饰器物、语言文字都充分地碰撞、融合、凝聚,虽然始终保持着各民族的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凝聚机制下共同性也愈来愈多。“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不但会实施具体行为,还会有意或无意地对行为中的‘共性’要素进行归纳,久而久之,一套为大家普遍接受与遵守的行为规律就被抽象出来了”。^③ 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汉字书写文化、科举制度等共性因素下深刻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充分包容汇合儒释道伊的共同性的文化。在近百年来的民主、民族革命中,中华民族更是凝聚、形成与升华

^① 麻国庆《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第65页。

^③ 刘顺峰《法人人类学中的习惯:概念谱系与阐释范式》,《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3.主导效应。实际上,文化的聚合凝聚往往与国家、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宗教等具有主动性聚合机制或力量的作用有关。统治者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往往会选择性地吸收某种在当时具有前沿性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政治哲学等作为具有一定主导性的文化建设内容,从而形成具有一定主导性的文化潮流或意识形态。这种文化的主导性效应也对于文化的共同性生成具有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例如,中国从汉朝开始,选择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社会教化的主要学说;北魏曾经要求朝政上下主动学习汉文化;唐朝曾经大力推行佛教。其他国家,如罗马帝国曾经对于基督教从抵制走向大力推行,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教作为主导性的文化等。但实际上,在当时以帝国为主的历史时期,这些主导性的文化往往也是以容纳多样性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的文明始终是多姿多彩不断发展的;但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存在主导性的力量或因素,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

(二) 同化主义中多样性趋向同一性的效应与机制

多元一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理论,或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能够容纳多元与一体之间复杂的、辩证的、动态的、有机的互动关系,是对真实的世界的规律的主动掌握与运用。相比而言,同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助外部力量追求文化同质化的属性,体现为对于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理解为二元的,居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对于不同文化因素进行排除而非容纳。因而,同化主义造成了以下效应。

1.除数与减数效应(以趋同为目标而造成)。同化主义往往希望以一种文化模式同化其他多种文化,不断减少文化类型、文化身份。同化主义实际上是很难在现实中寻求到实践空间与操作可行性。因为文化的有机性生生不息,同时也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完全覆盖其他所有文化类型的文化。因为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吸收本身已是事实。然而,同化主义相当于发挥着文化的除数或减数效应,在同化主义的机制下,文化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丰富多彩到逐渐萎缩,文化的内涵会逐渐单薄,由于缺少多样性文化的相互碰撞,文化的创造性与活力也会下降。

2.同一性效应(而非共同体效应)。由于同化主义力图减少文化的多元性、消弭差异性,因而也就不断削减和空置了构成共同体的各个要素,最后,同化主义将无法建构共同体,只能形成同一性。

(三) 多元文化主义中多样性趋向复合共同体的效应与机制

1.加数效应。多元文化主义鼓励保持多样的文化身份、文化个性,主张保持差异性基础上的文化繁荣,这有利于人们加强对自身文化的珍重、热爱与保护,有利于各种文化的平等发展与繁荣。但是,由于与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渊源关系,多元文化主义注重保持文化个性,注重论证于凸显文化自身体系的价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化之间的边界。这使得文化多元主义相比多元一体主义,多元文化之间趋向共同性的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加数效应而非乘数效应。

2.复合共同体效应。多元文化主义主导下,共同体的建设更多地体现为是多元文化相加的复合共同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多元文化主义缘起于西方,尤其是西方的一些移民国家、联邦制国家。在这些国家,常常出现由相互迥异的、来自不同大陆、不同文明体系的族群、民族组建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例如,加拿大、美国等,因而这些国家比较适用于以多元文化主义来构建复合的共同体。但在中国,在历史上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因而是以多元一体主义构建深度交融的共同体,而不是复合共同体。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一特性,致使在现实政策维度上共同体建设遭遇了一些困境,例如,欧洲曾经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欧洲失败”。这说明,作为一种理论与价值理念上包容不同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面遭遇了挑战。

以上分析说明,多元一体主义具有乘数效应、凝聚效应、主导效应三大效应,一方面能够保存文化差异性 & 多元性的创造性活力,另一方面又促进形成具有主导性和凝聚性的共同体,在多元与一体两个维度同时具有积极性价值,由此多元一体主义对于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三大效应的超越性也凸显了多元一体主义基于其内在逻辑的理论规范性和实践价值。

二、多元一体主义、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逻辑 与多民族国家建设制度选择

以上我们论述了多元一体主义、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所产生的效应,由此出发,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在共同体建设方面,以上三种理论的基础逻辑和实践特点以及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

(一) 三种理论从多元到共同体(或一体)的基础逻辑与路径

这三种理论路径在多元性之间的界限、差异性与共同性的通道、共同性形成路径、所形成的共同体(或一体)的属性、特点及价值规范都有不少差异。(见表1)在比较中我们可进一步发现、论证多元一体主义的理论规范性、内在价值对于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意义。

笔者以为,表1的内容中,多元性之间的界限、多元性与共同性之间的通道这两个因素对于三种理论的内涵与走向有着关键影响。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1.多元性之间的界限。多元性之间的“界限”影响着共同体的建设。首先,多元性之间界限的形态或者说对其形态的预设决定了不同的共同体建设路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多族群、多文化呈现的界限属性,以及不同的理论政策趋向对于多族群、多文化群体界限属性的认识、界定、设定目标,决定着共同体建设的方式或者说共同体的属性。结合表1,笔者认为,多元一体主义具有突出的特点与优势,这体现在无论是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主义诞生的民族交往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还是一种理论

表 1 不同理论从多元到共同体(或同一、一体)基础逻辑及形成路径

	多元性之 间的界限	差异性与共 同性的通道	共同性形 成路径	“一体” 属性	共同体的特 点与价值
多元一体 主义	柔和	双向、 流动性好、 可逆	多元交融、融汇与 共(n个多元界限 存在但柔和)	融汇为多元一体的 共同体(共性、差异 性并存)	流通活力、 沟通共识、 团结进步
多元文化 主义	固化	双向、 流动性弱、 部分可逆	多元相加(n个多 元界限清晰)	结合为复合共同体 (共性不足、多元性 强)	注重差异、 有限团结
同化主义	消弭	单向、 流动性弱、 不可逆	融和一体(n个多 元界限完全消除)	一体性不断增强形 成同一性,但逐渐不 具备共同体属性 (因为多元性消弭)	反对差异、 同质性

归纳、范式与预设,还是价值引领,多元一体主义在各个层面都呈现为各多元群体之间具有柔性的界限,表现为既承认多元之间的界限,但不固化这一界限,在理论范式方面发展出民族平等团结、民族之间守望相助、命运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一起走向现代化理论等,引领与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价值;同化主义致力于消除多元之间的界限,在事实层面上与理论归纳、范式上体现为对于历史上产生的无论是自然同化还是强制同化都进行合理化承认,在理论预设方面追求同质化以及对于民族消亡的历史趋势规律的非全面性认知,导致对民族关系进行违背规律的激进化处置,在价值方面较为混杂地包含着片面的科技进步主义、主张存在文化优劣之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之间的边界,在事实层面一定程度上缘起于西方移民之间,欧美白人与美洲土著人之间显著的文化差异,在理论范式上十分强调文化之间基于界限的相互尊重与文化主体性发展,在理论预价值方面有民族自治、自决、“承认的政治”等,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共同体的构建的理论与现实层面都遭遇现实瓶颈,在现代化发展方面容易形成民族之间“尊重而疏离”的局面,甚至形成发展鸿沟,不利于共同体建设。

从历史上来讲,虽然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多源性,但各个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却更快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叠加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中华民族历史上,诸子百家交流争鸣、南北民族融合,佛教的传入、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是则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域。从亚洲及世界历史可以看到,通过战争、几大宗教的传播,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欧、亚、非洲的物质、思想、文化充分地交换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 20 多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尽力收集各国的信息,并派遣出各种特使和代表,探索哪里是世界上最佳的市场,”“2000 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

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存在。”“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的足迹”。^①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熟悉的繁荣记忆”,^②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促进全球化贸易和各个国家、民族充分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如何看待多元性之间的界限也是多元一体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区别的核心内容。虽然从大航海时代,西方促进了近现代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技术与殖民主义等因素的结合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与贸易带有不平等的因素,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也诞生了“东方学”“远东”“近东”等概念,将东方错误地描述为与西方的繁荣、文明相对的落后、愚昧。与文化相对主义相伴,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东方国家和民族,非国家社会,包括非洲、美洲的原始部落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促进了人类对于自身及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具有促进人类加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沟通交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也产生了对于不同文化体系边界过于强调的效应,这也使得在西方产生了很多对于不同的民族进行区别性、本质性描述和研究的论著。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一些学者、传教士、旅行者对非西方社会不同种族的体质、文化、语言、风俗的描写,混合着正确的观察和一些传闻记述、猎奇想象,为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材料。虽然,白人种族主义有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结构性的根源,但对于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的本质性与边界的固化认识与夸大无疑为某些论证白人民族优越论进一步提供了方法论。文化相对主义论证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以此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也出现了为了论证这一独特性而固化民族界限,或对某些民族进行本质主义描述的倾向,这实际上又为一些种族区别论、种族阶层论所利用。因此,多元一体主义文化之间的柔性的边界更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与交流,也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与民族平等的价值,对于促进文明互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中国重启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文明互鉴的“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西方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与阻挠全球化,而其内部,甚至出现了民粹主义、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复燃的趋势。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容的全球化是否真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答案不言自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平等看待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多元性,既尊重民族个

^① [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等译、徐文堪审校《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序言XI。

^② [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徐文堪审校《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文版序言XI。

性,又重视共同价值与共同愿景,促进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多元一体主义价值对于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多元性与共同性之间的“通道”。多元性与共同性之间的“通道”是决定三种路径的核心因素。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差异性转化为共同性的通道是单向还是双向流动,流动性的强弱、是否可逆等,决定着共同体是活态有机生长还是刻板机械固化。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多元性与共同性之间流动性好。这有利于形成“增进共通性、保持差异性”这一“似乎不可能实现”的双赢结果。对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我们可以暂且称为“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流动性融汇增长原理”。这一原理打破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刻板、二元的思维。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特点是将多元与一体作为质的规定性,将两者作为对立的观念。

以往,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有机体,很多研究几乎是按照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来进行分析,倾向于多元性要素与一体性要素,或者说差异性要素与共同性要素就是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在这种近乎刻板的理性主义思路下,诞生了同化主义及与其相对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路径:前者最大限度地消弭差异性,以求共同性的最大值或者说一体化的最稳固状态;后者极大程度地发展多元性以规避共同性或者说一体化对多元性的减损。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都是十分有害的。

按照社会文化有机体生长的角度,可以导出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流动性融汇增长原理,即差异性可以随时流动为共同性,共同性的内涵也可以逆向流动反哺差异性。例如,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任何群体都需要借鉴和借助共同体的先进或共同经验不断发展自身的现代化水平,而不同民族和族群的现代化发展活力与路径又能为共同体的现代化贡献丰富的形式与可能性。由此看来,流动性机制下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融汇共生,能够相互增进,形成能量的最大化。从共同体文化丰富发展、共同体创造力的与活力的繁荣增长来看,一个流动性的、相互交融、不断沟通理解与团结的、具有共识与活力的共同体之强大繁盛,一定会超过刻板、机械、固化、缺乏沟通理解与共识的共同体。

(二) 三种理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

由于三种理论路径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中,都呈现出对于制度建构、政策设计、民族事务治理的导向、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提升多元一体主义作为一种共同体与国家建设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表2内容即结合目前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实践的基本情况,是进行了抽象概括。我们应该认识到:第一,理论趋向对于实践具有导向性作用,因此,对于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的研究应回溯其理论渊源,找准方向、加深认识。第二,一些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针对不同的民族、族群、土著民族等,可能交替采取了以上不同的政策路径。第三,需要强调的是,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设定,以上三种理论只有在限定于某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一体认同之内时,才具备“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政治

学的规范性探讨价值。第四,中国的多元一体主义也包含有一定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因素,西方不少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实际上也具体实践了一定程度的多元一体主义。但总体上,多元文化主义与同化主义的规范理论成型于西方,多元一体主义则集中规范地产生于中国。

表2 不同民族理论政策及政治认同结构

	语言政策	文化政策	政治制度	认同结构
多元一体主义	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保障使用权利	突出文化的共同性价值,同时肯定多元文化的价值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统一的政治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统一的文化认同与多元的文化认同差序存在
多元文化主义	多种语言并行	突出文化差异性价值,多元化发展	联邦制,民族自决,高度自治	统一的政治认同;多元的文化认同
同化主义	一种语言	突出文化的同质性价值,一元化发展	不设置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制度	统一的政治认同;统一的文化认同;认同结构单一

三、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与多元一体主义

无论我们怎样总结历史,但毋庸置疑,民族问题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民族面临着“一起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同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及其共同性的现代化成长,也与中国在国内外“两个大局”背景下的自我定位与塑造密切相关。总体上,以历史上存在的多元一体的经验,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既明确地识别民族赋予民族政治身份与政治地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又十分重视区域性、整体性建设,强调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边界的柔性互嵌。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经验转化为一种理论自觉、理论共识、价值理念与政治治理经验,进而形成多元一体主义,这一过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转型与建设意义重大,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 中华民族的自觉促进多元一体主义发展

中华民族自觉促进多元性向共同性汇聚。建构现代主权国家以及进行代表主权国家的民族建设,是十八世纪以来“历史转向世界历史”^①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历史上

^①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是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开始的,即“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的各个民族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这一进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交往的理论,^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不能只是自我构建,而是必须、不得不在世界历史的交往关系中构建。由于内忧外患,民族主体在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迎来民族命运的转机,由自身与外部关系的反思而构建的中华民族,其自觉凝聚的共同体意识相比自在状态显著增强,同时,多元性也依然成为团结奋进的重要力量。例如,辛亥革命中各民族的革命先驱;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加入和帮助壮大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借助中华民族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人文、多样的生产方式,不同民族、地域中华儿女奋勇参战,形成广阔的战斗空间、灵活的斗争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既是历史推动下的救亡图存,也是理性抉择。伴随着民族危机、反侵略战争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理论界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也逐渐成熟:中国的国家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及对其进行的理论阐释,最终成为全中国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逻辑共识与精神动力。

(二) 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是不断促进多元一体主义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国族建设阶段。但是,中国的国族建设具有自身的共同体建设逻辑。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浴血奋战,建立了统一的、主权独立的、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主权国家的国族,对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显示民族尊严、捍卫民族自信,对内凝聚力量,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繁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往往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民族之名,满足垄断资本的利益。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代表着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在增进共同性的同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持着多样性。同时,国家与民族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的重建,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融汇生长的通道更为畅通。

首先,是国家与各民族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法理上规定国家是属于各民族人民的,同时,从政策上进行民族识别,承认公民的民族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承继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格局。国家在以法律建立各个层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时,明确这些地方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的元素迅速建立,在任何遥远边陲的村寨,代表国家的“党政领导”及其所带来的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都不会缺位。同时,大力地培养各个民族的党政干部,鼓励各个民族发展其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其文化教育。从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与公共文化中各民族的参与度来讲,这种共同性中前所未有地融汇了“多元性”的要素,从各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社会来讲,各民族

^①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与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国家”行为的公共性元素深刻影响着自己的生活。

其次是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在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建设中,续写与升华着“四个共同”的历史趋势。在历史上的共同奋斗基础上,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日益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的日益强大是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在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利方面,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管理国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元一体主义在事实、国家政治、政策和理念上都深入发展,体现为中国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前所未有地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价值共同体。

(三)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提升中国多元一体主义理论自信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其中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等。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纲”,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下做好民族工作;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党和国家“四个与共”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内涵,也体现了中国多元一体主义所构建的共同体真正精髓。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及相关论述不但在多元一体主义方面以“四个与共”界定了共同体内部密不可分、不可撼动的关系,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了多元一体间存在着的四组重要关系,为多元与一体关系的理论问题做出具有时代性的解答。即: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这四组关系中确定方针分别是: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实现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要赋予一切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①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8月28日),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8/28/c_1127804776.htm)。

上文我们论述,中华民族内部柔性的多元,以及韧性的一体的特征,形成了有利于共同体生成的流动性融汇机制。中央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四组重要关系的论述更加证实了这一论点。首先,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干、枝叶的关系,是验证了差异性与合作性流动融汇、相互滋养的关系;其次,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实现各民族的利益,同样体现的是整体与部分相互供给支撑,形成“大河”“小河”的共生,这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具有深厚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经验;再次,“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民心政治传统。从历史到现实二者从不冲突,二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特色与内涵,绝不能对立看待,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四组重要关系的论述对于当下全面理解与实践多元一体主义提供了逻辑分明、内涵具体的结构性理论阐释,有利于推进多层次立体性的多元一体主义实践。正如李志农通过对于迪庆的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研究指出,共同性的反义词不是差异性,与差异性具有反义的理念是排他性而不是共同性,因为共同性包容了差异性,这也说明了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流动性。由以上可以得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体”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同化主义下的均质化的一体,也不是多元文化主义下的结合体,而是融汇流动、互嵌发展的共同体。

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促进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新时代的提升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发展,应进一步促进多元一体主义理论的规范化发展,提升多元一体主义理论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多元一体主义的规范化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内在逻辑,加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整合、话语建设与哲学影响力。

四、结语

本文旨在对多元一体主义进行建设性论述,论证其成为一种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规范性理论的内在机制,以及相比多元文化主义、同化主义,多元一体主义更具共同体建设意义的理论路径与内涵。近现代以来,同化主义伴随西方民族国家的建设与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世俗化等趋势的发展有所上升,多元文化主义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多元一体主义是紧紧依托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哲学观念、民族观念产生。如果要真正理解它,并试图使其能有益于世界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不同于西方观念的借鉴,就不能仅仅从“想当然”的事实角度理解。深植于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原生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需要进一步从政策、理论、价值等方面规范化。虽然在不少多民族国家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多元一体的因素,

但其远未达到中国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厚性与理论自觉。在国际范围内民族理论的影响上,多元一体理论还不及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那样得到体系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产生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影响,这也是一种中国话语建设不足的表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历史之悠久、民族规模之大、民族治理之经验积淀,都足以产生具有足够阐释力且有益于人类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人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与统一的政治认同及其所需要的共同文化之间的张力,这使得多元与一体、差异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核心的问题,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发展成为紧张关系或相对立的范畴。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多元与一体和谐共生的一些突破性的认知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主义理论,应该被视作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规范性理论之一,进行深刻研究与发展。

(作者马俊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李冉)

CONTENTS

Column I: Thoroughl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 Tr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AO Zhong-hua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AO Xiao-hui (Qingdao University) (5)

Abstract: During its century-long course of striving forward and overcoming numer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cquired a wealth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historical 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pecifies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and “standing up for ourselves” as crucial historical experience leading to the success over the past century of CPC as a major Party, and enriches the idea of “never forgetting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and “having the courage and ability to carry on our fight”, which are put forward at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National unity is the lifeline for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unity.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quires us to adhere to the united front, to precisely analyze conflicts involving na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nd to dispel headwinds that might undermin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requires us to have the courage and ability to carry on our fight, so a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requires us also to maintain a global vis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o take on the socialist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whole.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ted front; spirit to figh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Column II: Studies on Theories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lexible Diversity and Resilient Unity: the Doctrine of Diversity in Un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 Jun-y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4)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a unified multi-ethnic nation, one of the most key theoretical themes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Founded on the historic facts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not to “integrate” but to “foster a shared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unity” in Chinese context are not the opposite of each other, but a pair of intertwined and symbiosis concepts. The key that makes Unity with Diversity a normative theory is that it surpasses and surmounts relevant theories from the wes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first, it breaks the past mindset that the fixed boundary exists between diversified communities; second, it breaks the idea of solidified border on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third, theories 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prehensively embody the doctrine of Unity with Diversity, and als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Unity with Diversity as a normative theory.

Keywords: doctrine of Diversity in Unity; flexible diversity; resilient unity;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construction of multi-ethnic country

Merging and Blending, Integration after Integration: Crucial Integration Event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

CAO Bing-wu (China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28)

Abstract “Chinese nation” is a collective term for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of China at present, and also the historical result of Chinese nation developing, expanding in unity with diversi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omparatively more distinct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yet for the time befo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Chinese nation had gone through several in-depth integration events by culturally merging, blending and integrating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us established the core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ultural identity as its main element. By combing through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outline several crucial ethn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since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round ten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that give birth to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diversity in unity; ethnic inte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